

孫中山的「大國之道」

• 高力克

孫中山是二十世紀中國偉大的革命家與政治家，他領導的革命運動終結了清王朝的統治，肇建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圍繞現代中國之「民族」、「民權」、「民生」三大問題，會通中國文化傳統與西方現代文明，構想了一個富有高遠文明理想的中國現代性方案。辛亥革命以降激蕩百年的中國現代化歷程，正在日益彰顯孫中山「大國之道」的遠見卓識。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圍繞現代中國之「民族」、「民權」、「民生」三大問題，會通中國文化傳統與西方現代文明，構想了一個富有高遠文明理想的中國現代性方案。辛亥革命以降激蕩百年的中國現代化歷程，正在日益彰顯孫中山「大國之道」的遠見卓識。

一 文明富強的王道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是現代性的起源與基礎，現代性的生長以民族國家為歷史前提。在外敵侵凌的後發展國家，民族主義更具有抵禦外侮和推進現代化之社會動員的獨特功能。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以民族主義為第一主題。孫的民族主義，以建設一個文明與富強的現代國家為鵠的。

在孫中山看來，現代世界是一個民族主義的時代，現代國家皆以民族主義為立國之基礎。英國的稱雄世界，源於其盎格魯—撒克遜民族主義。日本的崛起東亞，亦離不開其大和民族的民族主義。而中國的衰落，就在於民族主義之闕如。中國人如一盤散沙，完全缺乏國族的凝聚力，因而國勢日趨衰落。

中國自古以來就呈現出一種以文化凝聚民族的「天下」秩序，中國式的「文明國家」在晚清遭遇了歐洲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現代文明的深刻挑戰。列文森 (Joseph R. Levenson) 認為，近代中國思想的一個重要轉折，是從「天下」到「民族國家」、從文化主義到民族主義的轉變^①。這正是梁啟超「新民說」的思想主題。但孫中山的民族主義不同於以民族國家為宗旨的歐洲民族主義，它是一種與中國文化傳統一脈相承的文化民族主義。如果說梁的民族主義之價值重心在現代的「國家」，那麼，孫的民族主義之價值重心則在前現代的「民族」。

關於「民族」與「國家」，孫中山作了以下區分：民族是由共同的血統、生活、語言、宗教、風俗習慣等天然力之演化而形成的；而國家則是武力之征服的產物。中國自秦漢以降大體上由一個漢民族形成一個國家，而大英帝國則是以霸道造成的。中國政治史證明，王道順乎自然，自然力即王道，用王道造成的團體就是民族。武力即霸道，用霸道造成的團體就是國家，如英國廣大的領土就是用霸道造成的。而香港幾十萬中國人團結成一個民族，則是一個自然而然的歷史過程。無論英國殖民者用何種霸道，都不可能改變^②。因而，許多不同人種所以能結合成種種相同的民族，不能不歸功於血統、生活、語言、宗教和風俗習慣這五種力。這五種力，是天然進化而成的，而不是用武力征服得來的^③。

孫中山的民族觀強調前政治的族裔認同和歷史文化傳統的民族整合功能，這一源於儒家王道思想和中華文明國家歷史的民族觀，使其民族主義具有不同於歐洲民族主義的文化民族主義的色彩。他以王霸之辨詮釋「民族」與「國家」，將「民族」歸為自然演化的歷史文化共同體，而將「國家」視為武力征服之戰爭的產物，由此揭示了西方民族國家之源於戰爭的「帝國」面相。

孫中山認為，大凡一個國家之所以能夠強盛，起初都由於武力發展，繼之以種種文化的發揚。但是要維持民族和國家的長久地位，還需要有良好的道德，這樣國家才能長治久安^④。中國在元朝亡於蒙古人，在清朝亡於滿族人，但由於中國人的道德遠高於蒙滿人，故民族得以延續，而且在文化上有力量同化征服者。孫中山強調指出：「中國在沒有亡國以前，是很文明的民族，很強盛的國家，所以常自稱為『堂堂大國』，聲名『文物之邦』，其他各國都是『蠻夷』。以為中國是居世界之中，所以叫自己的國家做『中國』，自稱『大一統』。」^⑤中國人自古是熱愛和平的民族。中國幾千年以來奉行「平天下」主義，征服了亞洲各小國。但是中國不像歐洲人的野蠻式征服，而多用和平的「王道」去收服各弱小民族^⑥。昔日南洋各小國前來進貢而歸化中國，是其仰慕中國文化而自願歸順，並不是中國以武力去欺壓小國^⑦。孫中山的政治理想，是以文明的王道取代強權的霸道，在世界上實現中國古老的王道秩序。

對於孫中山來說，中國要實現民族的復興，首先要超越家族本位的傳統，而把全國人民凝聚成一個國族團體，形成強有力的國族認同。而民族復興的根本，在於弘揚偉大的中華道德傳統。孫中山強調：「窮本極源，我們現在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聯合起來做一個國族團體以外，就要把固有的舊道德先恢復起來。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後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圖恢復。」^⑧在孫中山看來，中國道德冠絕世界，其最寶貴的遺產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諸德，此為中國民族精神之表徵。中華民族的復興，歸根結底有賴於其道德傳統的發揚光大。

關於中國「和平」之德，孫中山尤為稱道，並且將和平與武力視為文明與野蠻的分水嶺。他指出^⑨：

中國更有一種極好的道德，是愛和平。現在世界上的國家和民族，止有中國是講和平；外國都是講戰爭，主張帝國主義去滅人的國家。……中國人幾千年酷愛和平，都是出於天性。……所以中國從前的忠孝仁愛信義種種

孫中山源於儒家王道思想和中華文明國家歷史的民族觀，使其民族主義具有不同於歐洲民族主義的文化民族主義的色彩。他以王霸之辨詮釋「民族」與「國家」，將「民族」歸為自然演化的歷史文化共同體，而將「國家」視為武力征服之戰爭的產物。

的舊道德，固然是駕乎外國人，說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駕乎外國人。這種特別的好道德，便是我們民族的精神。我們以後對於這種精神不但是要保存，並且要發揚光大，然後我們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復。

少年求學於美國和香港的孫中山，具有開闊的文明視野和開放的文化襟懷。其醫者出身的知識背景，對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體認尤深。他認為，中國欲實現富強，除了要大力弘揚中華道德傳統外，還需努力學習歐美的先進文明。歐美文明的先進主要在於科學技術和物質文明，中國比其落後了幾百年。因而中國只有全力學習歐美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物質文明，才能「後來者居上」，實現民族的富強和復興。

孫中山之民族主義的終極目標，是實現儒家王道的天下秩序和大同理想。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是一種植根於儒家傳統的「王道民族主義」，具有鮮明的道德民族主義或文化民族主義色彩。他所夢寐以求的新中國，是一個富強、和平、文明、道德的大國。

關於學習西方，孫中山反思了日本的民族主義與學習西方的經驗教訓。日本的經驗使他樂觀地相信，中國從前雖然落後了西方幾百年，但是只要幾年就可以迎頭趕上，日本便是一個好榜樣。日本從前的文化學自中國，其水平比中國低得多。但是日本近來專學歐美文化，不過幾十年便成世界列強之一。如果中國人覺醒了，也像日本人一樣，大家提心吊膽地去恢復民族的地位，十年之內就可以把外國政治、經濟和人口增加的種種壓迫和禍害都一齊消除^⑩。

另一方面，孫中山則反對日本效仿西方而對外奉行的強權主義和蠶食鄰國的軍國主義行徑。明治以來日本奉行「富國強兵」與「脫亞入歐」之國策，步趨西方列強之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成為稱霸東亞的新帝國。在孫看來，中國古代對於鄰國講究信義，即使國力強盛也沒有去消滅別國。如高麗，從前名義上是中國的藩屬，其實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直至日本侵略才失去自由。可見日本的信義不如中國^⑪。

孫中山強調，中華文明自古具有「濟弱扶傾」的傳統，中國因為一直奉行這一政策而強盛了幾千年，安南、緬甸、高麗、暹羅諸小國能夠得以保持獨立。因而，中國如果強盛起來，不但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還要對於世界擔負一個重大的責任。否則，中國強盛了對於世界便有大害而無大利。現在世界列強所走的是毀滅別國的路；如果中國強盛起來，也去學列強的帝國主義，就是重蹈其覆轍。「濟弱扶傾」，才是盡中華民族的天職。「濟弱扶傾」就是扶持弱小民族，抵抗世界列強。如果全國人民都立定這個志願，中國民族就可以發達^⑫。

孫中山之民族主義的終極目標，是實現儒家王道的天下秩序和大同理想。他指出：「我們要將來能夠治國平天下，便先要恢復民族主義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礎，去統一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這便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大責任。」^⑬

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是一種植根於儒家傳統的「王道民族主義」，其以道德立國的旨趣，具有鮮明的道德民族主義或文化民族主義色彩。西方的民族主義是一柄雙刃劍，它集民族國家之認同與帝國強權之邏輯於一體。孫中山重視民族主義之民族建國的動員功能，同時又反對其帝國擴張的強權邏輯。他以王霸之辨區分「民族」與「國家」，與梁啟超的「民族主義」與「民族帝國主義」二分法，對西方民族主義之取捨異曲同工。孫中山的王道民族主義，以建設文明與富強的新中國為目標。作為一個偉大的愛國者，孫中山畢生為中華文明復興之偉業

而奮鬥。他所夢寐以求的新中國，既是一個富強的大國，也是一個和平、文明、道德的大國。對於孫中山來說，像日本那樣亦步亦趨西方帝國的「脫亞入歐」，即使由西方化而強盛崛起，亦絕非日本文明的勝利，故不足為訓。由此可見，孫中山的王道民族主義所表徵之中華文明的宏大氣派。

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是天下理想與民族主義的統一。他主張以民族主義抵抗西方帝國主義侵略，弘揚中華傳統道德，「濟弱扶傾」，以實現世界大同之理想。對於孫中山來說，民族主義的基本目標是中華民族的富強與復興，而其終極理想則是民族融合的世界大同，這正是中華文明古老的「王道」思想與世界主義會通的偉大理想。

二 強民主與強政府的新民權政治

作為二十世紀中國偉大的民主革命家，孫中山畢生信奉和追求民主理想。他堅信，民主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趨勢。人類歷史循神權、君權、民權的更替而演進，現在世界潮流已經到了民權時代，民權的潮流浩浩蕩蕩，勢不可擋。民主化亦成為中國政治轉型的歷史目標。

孫中山對於民主政治有着深刻的理解。對他來說，其民權主義理論要回應現代民主的兩大難題。首先是代議制民主的困境。源於古希臘城邦政治的「民主」，其古義為「人民的統治」，特指城邦公民自治的政治制度。而現代英美式的代議制民主，則是一種「人民同意的精英統治」。在現代自由民主體制中，公民通過選舉代表而由精英代行治理。古今民主的這種從簡單民主到複雜民主、從直接民主到間接民主、從城邦民主到議會民主的演變，使「民主」產生了人民主權理論與權威治理實踐之間的深刻張力。人民主權的崇高正當性與人民知識能力的有限性之間的巨大差距，成為現代民主最為深刻的悖論。韋伯關於官僚制與民主制並存的命題，深刻揭示了這一現代民主的弔詭。

孫中山認識到人民主權與人民能力之間的巨大差距，因而他並不贊同絕對民主的激進觀點。另一方面，歐美先進國家代議制政體的缺陷，在於人民沒有控制政府的權力。孫中山民權主義的宗旨，是建設一種超越西方的新型民主。



孫中山畢生信奉和追求民主理想。

孫中山的政治理想，是建設一個「完全民治的國家」。孫中山民權主義關於人民權的設計，即採用瑞士和美國西北諸州所實行的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和複決權的四權模式。擁有此四項民權，人民才能真正管理政府。此即「全民政治」。

阿爾蒙德 (Gabriel A. Almond) 將政府能力與大眾參與歸為政治發展的兩大主題：「政府的權力和效能，和公眾對政府影響的程度，是兩個衡量政治發展的標準。政治發展指國家的發展和國家的民主化。」^④而在三權分立的憲政體制中，其政府能力和民主參與之程度往往成反比。分權的民主政府之行政效能往往不及集權的威權政府，政府低效成為現代民主政治的又一大困境。而後發展國家往往為追求效率，更多與威權主義結緣。十九世紀德意志帝國「後來者居上」的強勢崛起，對西方民主國家形成了嚴峻挑戰。

如何超越現代民主的這兩大困境，成為孫中山政治理論的基本問題意識。他在總結民主政治發展的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建構了其民權主義理論。

孫中山認識到人民主權與人民能力之間的巨大差距，因而他並不贊同絕對民主的激進觀點。在他看來，傑斐遜 (Thomas Jefferson) 的激進民主理論和法國大革命之充分民權實驗都是不可行的。另一方面，西方的民主遠不完備，歐美先進國家實行民主一百多年，至今只實現了代議制民主，人民僅獲得了選舉權。這種代議制政體的缺陷，在於人民沒有控制政府的權力。因而民主問題的本質，是如何使人民具有名副其實的控制政府的權力。孫中山民權主義的宗旨，是建設一種超越西方的新型民主：「我們拿歐美已往的歷史來做材料，不是要學歐美，步他們的後塵；是用我們的民權主義，把中國改造成一個『全民政治』的民國，要駕乎歐美之上。」^⑤

作為一個後發展國家的革命家，孫中山對民主與政府效能的悖論更為敏感。他注意到，民權的伸張往往以限制政府權力和削弱政府能力為代價。因而，民權發達的國家，政府往往能力低下；而威權國家，政府則多有強大能力，如十九世紀德國俾士麥 (Otto von Bismarck) 專制政府的高效能。在孫看來，「近幾十年來歐洲最有能的政府，就是德國俾士麥當權的政府。在那個時候的德國政府，的確是萬能政府。那個政府本是不主張民權的，本是要反對民權的，但是他的政府還是成了萬能政府。」^⑥因而，民主和政府能力的悖論，成為民主政治的一大困境。

現代民主政治的不完備，一是其代議制的弱民主，二是其有限政府之效能不足的弱政府。如何解決現代民主之人民主權與民眾能力、民主政治與政府效能之兩大悖論，從而達致強民主與強政府的兩全其美？

孫中山的解決之道是「權能分開」，即人民主權和政府能力之分。「權能分開」理論的要旨，是以人民主權與政府治權的分立，達致民主與權威的平衡。孫中山設想：「在我們的計劃之中，想造成的新國家，是要把國家的政治大權分開成兩個。一個是政權，要把這個大權完全交到人民的手內，要人民有充分的政權可以直接去管理國事。這個政權，便是民權。一個是治權，要把這個大權完全交到政府的機關之內，要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國事務。這個治權，便是政府權。」^⑦質言之，「權能分開」的政治將是一種高效的民主政治。其間，人民有更多的權力，政府亦有更強的效能，從而達致強民主與強政府的統一。

孫中山的政治理想，是建設一個「完全的民治國家」^⑧；「要造成徹底的新民國」^⑨。他理想中的民主政治模式，是瑞士的自治式民主政體。他指出：「何謂民權？即近來瑞士國所行之制：民有選舉官吏之權，民有罷免官吏之權，民有

創制法案之權，民有複決法案之權，此之謂四大民權也。必具有此四大民權，方得謂為純粹之民國也。」^②孫中山民權主義關於人民權的設計，即採用瑞士和美國西北諸州所實行的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和複決權的四權模式。人民管理政府之關鍵，在於有權管理官吏和法律。人民通過選舉權而選拔官吏，通過罷免權而控制官吏。同時，人民可以運用創制權而創制新法律，運用複決權而修改和廢除不良的舊法律。擁有此四項民權，人民才能真正管理政府。此即「全民政治」。孫強調，這些直接民權源於實際的經驗，而非虛構的理想。選舉權、創制權和複決權已行於瑞士，而美國西北諸州則已實行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和複決權四項民權^②。

關於治權改革，孫中山設想在西方憲政體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權模式的基礎上，再增補考試權和監察權，二者源於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和御史制度。他相信，科舉的考試選官制度是中國古代文明的一大特色，歐美現代文官考試制度即借鑒了中國古代科舉制的遺產。西方的監察權即彈劾權設置於立法機關之中，未成為一種獨立的治權。西方三權分立的制度雖已實行了百年，但還不完備。中國古代的考試權和監察權的遺產，可以補充西方三權分立制度的不足。

孫中山相信，這種中西合璧的「五權憲法」是真正完美的民主政治：「我們現在要集合中外的精華，防止一切的流弊，便要採用外國的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加入中國的考試權和監察權，連成一個很好的完璧，造成一個五權分立的政府。像這樣的政府，才是世界上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國家有了這樣的純良政府，才可以做到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家。」^②

孫中山的民權主義，旨在以政權之四權擴充代議制民主之人民權力，以治權之五權增強政府之管理能力，實現強民主與強政府合一的「全民政治」。「五權憲法」的新民主政治是綜合現代民主政治的制度創新，而非否棄現代民主成果而另起爐灶的制度實驗。這一中西合璧的「全民政治」模式，融合了人類政治文明的豐富遺產，其中有英美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權與選舉權，瑞士和美國的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複決權，以及中國古代的考試權、監察權。此九權無不出於中西歷史經驗，而並非浪漫的理念玄思。

孫中山追求的新民主政治模式，融英美式自由民主、瑞士美國式的共和民主與德國式的全能政府於一體，旨在以這種「權能分開」的民主精英政體，強化人民的民主權力和政府的行政能力，以大眾民主補充自由民主，以「全民政治」的強民主和強國家模式，超越代議制民主的弱民主和弱國家模式，從而回應了現代民主問題和後發展中國之民主轉型問題的雙重挑戰。

孫中山追求的新民主政治模式，旨在以「權能分開」的民主精英政體，強化人民的民主權力和政府的行政能力，以大眾民主補充自由民主，以「全民政治」的強民主和強國家模式，超越代議制民主的弱民主和弱國家模式。

三 公平均富的民生主義經濟

民生主義作為孫中山的經濟建設方略，旨在回應工業化時代日益深刻的社會問題和社會主義潮流。歐洲工業革命以來，資本主義造就了前所未有的物質文明，亦導致了貧富懸殊的社會分化。自由與平等的衝突，成為現代文明的一

個深刻困境。十九世紀以來，歐洲反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運動蓬勃興起，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更是預示着二十世紀社會主義的強勁潮流。民生主義即對社會主義潮流之回應。

所謂「民生」，即人民的生存，是孫中山歷史哲學的核心理念。孫認為，民生是社會進化的重心，因而是人類歷史的重心。民生之於經濟、政治、社會、道德等，都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社會的文明發達、經濟組織的改良和道德進步，都是以甚麼為重心呢？就是以民生為重心。民生就是社會一切活動中的原動力。」^②對於孫中山來說，現代世界的社會問題，就是民生問題。民生主義以解決民生問題為其旨，因而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

孫中山指出，今日歐洲的社會主義有兩大潮流，一是歐洲的改良的社會主義，主張對資本主義實行社會化的和平改革；一是馬克思的革命的共產主義，主張無產階級推翻資本主義的社會革命，如俄國的道路。俄國在革命後即退而實行「新經濟政策」，表明其共產主義經濟革命並不成功。孫中山認為，根據晚近幾十年歐美社會進化的趨勢，最好的社會主義是歐洲改良式的社會主義，其主要政策是分配的社會化，消滅富人的壟斷，多徵資本家的所得稅和遺產稅，交通運輸等行業的國有化，改良工人的教育、衛生與工作環境等等^③。歐洲和平的社會主義與馬克思的革命的社會主義，分別取「節制資本」與「消滅資本」之方法。孫中山的民生主義，主要採借了「節制資本」的歐洲改良式社會主義。

孫中山將馬克思歸為研究社會問題最深刻的思想家，但他並不同意馬克思唯物史觀和共產主義學說的基本理論。在孫中山看來，社會進化的動力是大多數人經濟利益的調和，而不是人們經濟利益的衝突。社會進化的定律，是人類求生存，而不是階級鬥爭。階級鬥爭只是社會進化過程中所發生的病症。馬克思對社會問題的研究，只見到社會進化的毛病，沒有見到社會進化的原理。因而，他認為馬克思是一個「社會病理家」而不是一個「社會生理家」^④。

孫中山認為，歐美近幾十年來的社會化改良，已經取得相當進步。如英國工人以罷工爭取八小時工作制，後來獲得國家的立法支持。德國俾士麥首相執政時期，以國家力量救濟工人，強制推行八小時工作制，以及工人養老和保險制度。美國亦借鑒了德國的政策，如福特汽車公司實行工人保險制度和八小時工作制，並為工人提供良好的工作條件。隨着經濟的發展，歐美工人的收入也逐漸提高，並沒有出現貧困化。這些和平改良的社會進步，都是馬克思所始料未及的^⑤。

作為一個偉大的政治家，孫中山的中國現代化方案決不以西方資本主義式的「富強」為止境。一個公平而均富的中國，是孫中山追求的高遠社會理想。他強調指出^⑥：

今日許多人以為改造中國，不過想將中國弄成一個極強大的國，與歐美諸國並駕齊驅罷了。其實不然。今日最富強的莫過英、美，最文明的莫過法國，英是君主立憲，法、美皆民主共和，政體已是極美的了，然國中貧富階級相隔太遠，仍不免有許多社會黨要想革命。蓋未經社會革命一層，人民不能全數安樂，享幸福的只有少數資本家，受苦痛尚有多數工人，自然不能相安無事。……吾人眼光不可不放遠大一點，當看至數十年、數百年

孫中山並不同意馬克思唯物史觀和共產主義學說的基本理論。在他看來，社會進化的動力是大多數人經濟利益的調和，而不是人們經濟利益的衝突。社會進化的定律，是人類求生存，而不是階級鬥爭。階級鬥爭只是社會進化過程中所發生的病症。

以後，及於世界各國方可。如以為中國資本家未出，便不理會社會革命，及至人民程度高時，貧富階級已成，然後圖之，失之晚矣！

孫中山的中國現代化規劃，眼光極其遠大，它不僅追求「富強」、「民主」，而且以「均富」為目標。

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採用歐洲「妥協家」與「和平派」的溫和社會主義方法，取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中道，主張中國經濟發展走一條自由市場與國家干預相結合的「第三條道路」，採取國家資本主義的公私混合經濟模式。孫的民生主義經濟模式的兩大基本方針，為「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

孫中山「平均地權」的主張，借鑒了美國社會主義者喬治 (Henry George) 的土地公有思想。在他看來，農業中國的工業化，土地問題至關重要。歐美資本主義經濟的入侵引起了中國各種制度的變遷，而所受的第一大影響，就是土地問題。工業化和城市化所導致的地價飛漲，使地主可以不勞而獲地收取暴利，獨享開發之利。歐美國家在工業化初期並無注意土地問題，致使其積重難返，至今無法解決土地問題所生之弊端。因而，中國的發展要思患預防，在工商業發達之前盡早解決土地問題。

孫的「平均地權」的政策，就是由政府對土地按照地價收稅和按照地價收買。政府制訂照價收稅和照價收買兩種條例，可防止地主漫天要價，使政府與地主可以折中的市價交易土地。土地收購以後，法律規定日後地價上漲的收益完全歸為公有。因為地價上漲是工商業進步和社會改良的結果，這種進步和改良是眾人的力量經營而成的，所以由此漲高的土地增值收益，應該歸之大眾所有和共享。這種「平均地權」的政策也是共產——一種共將來之產的贖買方法。這種將來的共產很公道，以前有產業的地主也不致吃虧^②。質言之，這是一種雙贏的「共產」。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民佔全國人口的大多數。土地問題與農民問題密切相關。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來說，除了要解決城市化土地增值的社會共享問題外，還必須解決廣大農民的土地問題。孫中山的民生主義還包含「農民解放」的目標，他認為，民生主義欲達到目的，必須解決農民問題。而農民的生存依賴於土地，只有實行「耕者有其田」，才是對於農民問題的最終解決。政府應該運用政治法律手段，來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在中國，土地問題若能夠解決，民生問題就解決了一半^③。

「節制資本」是民生主義的另一方針。孫中山認為，歐洲的資本主義工業化導致了嚴重的貧富分化，社會主義運動應運而生。而在前工業化的中國社會，尚沒有大富的特殊階級，只有普遍的貧窮。與工業歐洲相反，農業中國的問題是患貧，而不是患不均，這是中國和歐洲的最大差異。因而，中國不能實行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俄國現在由共產主義改行新經濟政策，就是由於其經濟水平不及英美發達，而不具備實行共產主義的條件。至於中國的社會經濟水平，更不可能實行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中國可以師馬克思之意，卻不可用馬克思之法。中國的工業化不能循西方資本主義的老路：由工業化發達而釀成社會問題後再行社會革命，而應在工業化起始階段就同步實行社會改良，預防社會問題和社會革命的發生^④。

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取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中道，主張中國經濟發展走一條自由市場與國家干預相結合的「第三條道路」，採取國家資本主義的公私混合經濟模式。孫的民生主義經濟模式的兩大基本方針，為「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

孫中山的民生主義經濟發展方略，旨在以「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的社會化政策矯正自由市場經濟，實行公私調和的國家資本主義混合經濟模式，打破地主的土地壟斷和資本家的資本壟斷，以防止伴隨資本主義工業化而來的貧富兩極分化，而實現「均富」的社會主義理想。

孫中山認為，民生問題的解決，有賴於發達資本和振興實業，但同時還須「節制資本」。所謂「節制資本」，就是採用歐美工業國晚近推行的社會化政策，如社會與工業之改良，運輸與交通事業收歸公有，徵收累進稅和遺產稅，分配之社會化等。另一方面，還要大力發展國家資本和國家實業，在交通、工業、礦產等關乎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實行國家經營，所得利益歸人民共享，防止私人大資本壟斷實業而導致社會的貧富不均。這樣，就可以使全國人民享資本之利，而免受資本之害^⑩。

中國現代化之基本趨向，是從「農業系統」向「商業系統」的轉型。孫中山的經濟建設方略，緊扣「土地」和「資本」這兩大問題，並借鑒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改良方法，解決城市化土地增值的社會共享和防止資本壟斷所導致的貧富分化，可謂抓住了農業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顛瀾激蕩的二十世紀，孫中山的民生主義經濟發展方略，旨在以「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的社會化政策矯正自由市場經濟，實行公私調和的國家資本主義混合經濟模式，打破地主的土地壟斷和資本家的資本壟斷，以防止伴隨資本主義工業化而來的貧富兩極分化，而實現「均富」的社會主義理想。

四 結語

孫中山是一個極具現代意識和世界視野的政治家，他的三民主義理論構想了一個恢宏的中國現代性方案，這一方案具有「駕歐美而上之」的宏遠目標。但其對西方文明的超越，是揚棄而不是拒斥；是現代文明的綜合創新，而不是脫離現代文明軌道的另起爐灶。孫中山對西方現代性的方針是：取其精華，補其缺弊。他既吸收了現代文明的主要成果如民主政治、科學技術與市場經濟等，也對其民族國家、議會民主、資本主義的偏弊進行修正。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理論所構想的後發展中國的現代性方案，具有深遠的問題意識：其民族主義，旨在中國天下理想與西方民族主義的會通；其民權主義，旨在民主政治與政府效能、代議制民主與共和主義民主的融合；其民生主義，則旨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調和。這一建國理論立足於中國後發展的國情，運用多元的現代意識形態作為解決中國問題的思想資源，創造性地回應了民族主義與天下理想、自由主義與共和主義及國家主義、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各種挑戰，構想了一條「文明、富強、民主、均富」的中國現代化道路。這條中國道路，以其對英、美、法、德、俄諸大國所表徵的現代文明價值之綜合與超越，而預示了其「大國」之文明規模。

孫中山的中國現代性方案順應世界潮流，立足本土歷史，其思想格局之大，在於中西文明融合會通之「中和」。中國復興的「大國之道」，須繼承與綜合中外古今之文明，以臻人類文明之集大成。「中和」乃大。蔡元培指出：中華民族富有中和性，法家的極端專制和道家的極端放任，均不久而失敗，終不能不轉到主張中和的儒家。中和的意義，是「執其兩端用其中」。即不走極端，而選

取兩端的長處，使之互相調和。孫中山的思想亦深受中和傳統的影響，在其三民主義理論中時時可見中和性的表現²⁰。

孫中山的文明綜合不是排外，而是在學習西方的基礎上的綜合創新。孫中山的「中和」的現代性方案，旨在創造一種融合人類一切文明成果的中西合璧的「混血文明」。其民權主義政治模式，融合了中國古代的考試權、監察權，英美自由憲政的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與選舉權，瑞士和美國共和主義的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複決權，以及德國式的行政集中的強政府，可謂集世界政治文明之大成。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具有鮮明的中華文明主體性，但其文明主體性並不意味着拒斥普世價值的抱殘守缺，而是中華文明會通世界文明的創造性重建。其以天下主義矯正民族主義，以中國考試與監察制度、共和主義、國家主義補充自由民主政治，以社會主義調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這種「中和」人類一切文明成果的現代性方案，才是立足本土文明、植根普世價值又超越西方模式的「大國之道」。

回眸辛亥以來的百年風雲，中國歷史幾經蹣跚徘徊，終於步入大國復興的正軌，歷史證明了孫中山「大國之道」的無與倫比的卓越歷史洞見。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民族」、「民權」、「民生」仍是轉型中國所面臨之最大的三個挑戰。歷經三十年經濟騰飛的中國，正處於發展的十字路口。中國的復興，必須會通中國文化與現代文明的優秀成果，創造性地解決文明與富強、民主與權威、效率與公平等問題，建構一個無愧於五千年文明的二十一世紀的偉大現代國家。「大國」之大，不僅僅在於高GDP和航空母艦所表徵的「富強」，而且更在於社會整體的「文明、民主、均富」。孫中山的「大國之道」，無疑為新世紀古老中華的大國復興留下了彌足珍貴的思想遺產。

中國的復興，必須會通中國文化與現代文明的優秀成果。「大國」之大，不僅僅在於高GDP和航空母艦所表徵的「富強」，而且更在於社會整體的「文明、民主、均富」。孫中山的「大國之道」，無疑為新世紀古老中華的大國復興留下了彌足珍貴的思想遺產。

註釋

① 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著，鄭大華、任菁譯：《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頁87-88。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 孫中山：〈三民主義 民族主義〉，載《孫中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頁618-19；620、621；679；649-50；650；663；680；683-84；690；683；691；691。

⑭ 阿爾蒙德(Gabriel A. Almond)著，林華、張彤譯：〈發展中的政治經濟〉，載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等著，羅榮渠主編：《現代化：理論與歷史經驗的再探討》(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頁362。

⑮⑯⑰⑱⑲⑳㉑ 孫中山：〈三民主義 民權主義〉，載《孫中山選集》，頁757；765；793；786；790；799；800。

㉒ 孫中山：〈建國方略 建國方略之三 民權初步(社會建設)〉，載《孫中山選集》，頁384。

㉓㉔㉕㉖㉗㉘㉙㉚ 孫中山：〈三民主義 民生主義〉，載《孫中山選集》，頁835；816；817；820-23；839；850；842；841-43。

㉛ 孫中山：〈在南京同盟會員餞別會的演說〉，載《孫中山選集》，頁93-94。

㉜ 蔡元培：〈三民主義的中和性〉，載沈善洪主編：《蔡元培選集》，下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頁1280-81。